

新书榜单

历史即是喜忧兼备的人生

深深的时代烙印



《我的几何人生》 丘成桐、史蒂夫·纳迪斯(美) 著 夏木清 译 译林出版社

本书是丘成桐自传,讲述了他的传奇人生:从中国乡村贫穷少年成长为著名数学家。书中特别收录丘成桐原创诗词赋文,尽显其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

四十年来我研究学问,处世为人,屡败屡进,未曾气馁。——丘成桐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英]玛格丽特·麦克伦伦 著 孙唯瀚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往往是一个陌生的国家,需要不断地重新审视和理解。作者从历史和集体记忆、个人认同、民族主义、记忆与遗忘、专业史家的职责等方面切入,剖析人们如何利用历史来认识过去、理解现在和想象未来。



《忧伤的喜剧》 刘开建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本书从认识喜剧开始,到喜剧原理,再到喜剧技巧以及创作中的常见问题等,一步步从理论角度结合实际案例分缕析地讲述出来。对有志于编剧的人士来说,是理论结合实战的指导。而对多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个走近自己喜爱的电影和剧目背后的一个入口。

《大英帝国3000年》 [英]杰里米·布莱克 著 王扬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本书以年代为轴,从战争、政权更迭、经济和文化发展等方面,从英国地理环境对其发展的影响入手,探讨了英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形成,介绍了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何从一个岛屿国家逐渐壮大,又如何逐渐式微的。

我们何以仍要返回

——读李成散文集《岁月深处故园情》

苍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土,而故土大抵与出生地、垂髫之年维系在一起。随着年齿渐长或者步入晚境,故土又总是与“返回”这个词相铤,仿佛故园里一扇老旧的木格窗,开闭之间均发出亲切的湿润。有人说,我回到故乡,再也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也有人说,我经常梦见童年的趣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不过表明,岁月深处的故土我们回不去了,尽管我们仍不断地回去,不断地找寻返回的途径。

近读李成回忆故园的散文集,忽然想到人的一生其实都曾有过本真,只是随着涉世渐深,内心慢慢被名利所充塞,被俗务所尘蔽罢了。读《门前的驴队》,那里流淌着那个年代朴质而美好的遗韵:“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这驴队的,仿佛忽然有一天,它们就出现在村道上。”作者描写驴队,“那瘦小而精巧的身型……那机警的眼神”,至于孩子们的骚扰,赶驴人的呵斥和微笑以及与村人的亲密互动,读起来是那么朴质而美妙。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行笔始终保持一种恍惚的回忆语调:“正如不知道驴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我们门前的一样,我也不知道何时驴队就从我们门前消失了。”

《山地的怀念》写少时清明跟父亲到山里。山里是父亲的舅舅家所在地,儿时常在那儿居留、玩耍和读书。祭扫后,父亲与表兄弟陷入对往日的回忆中,“麦田往上有一道土坎,上面残留着许多房屋的墙垣。表叔对父亲说,这就是老屋场。……”作者追问道:“但那时候,我在哪里呢?”这种回忆中的回忆,写出了生命的层递与怅惘。后来他独自来山野找表叔,恰逢表叔在松林里与一位乡亲谈话:“时值深秋,遍地都是枯黄的落叶;偌大的天地间寂静无人,只有他们蹲在那里……而远处还有一位山民从一堵山崖边赶过来,像一只鸟或者飞猿穿过屏风。”这画面铭刻在记忆的屏风中。

个人写作的意义,便是对遗忘的抵抗,对“戏说”与“篡改”的留证。如《防震杂记》写1976年唐山大地震带来的恐惧不安,那种缺乏科学知识的盲动与愚行,真实得荒诞不经。《借读记》叙述作者在乡邮员家“赠书”的事,其中的曲折、忐忑、尴尬、无奈和欣喜,惟亲历者方可写得如此细腻有趣,不难见出人性的良善与质朴,亦可见出故里文化的贫瘠。

有些地方是回不去的,而我们何以仍要一次次返回呢?

《沉甸甸的平凡》出版

本报讯 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马红霞新书《沉甸甸的平凡》近日与读者见面。新书中收入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25万多字,其中不乏在湖北省、全国获奖的作品。作家来自公路系统的企业,多年生活在基层,熟悉劳动一线劳动者,因此大多作品都是平凡者对平凡生活的解读,反映平凡生活对人的感召以及劳动者对美好的向往,展现了百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城乡的多元文化。(玛咖)

腑。这是我这些所谓“写工业”“写基建”的诗,跟报上常见的工人诗、车间诗有所不同的地方。

切莫小瞧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时代印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常常让读者甚至作者先入为主地格式化了叙事主体或抒情主人的倾向与言说方式。喜欢诗歌的人一定还会记得被列入朦胧诗范例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膀/——祖国啊!……”

1979年,舒婷的这首诗甫一问世,那不同寻常的诗句便惊动了世人并引发争议。据邵燕祥回忆,“1980年,某地刊物上郑重其事讨论舒婷的诗,就有人说她写出这样的诗,不符合灯泡厂女工的身份——也就是说这不属于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和言说方式。”

所幸,这样的场景终于成为过往。现如今,人们的言说方式繁多,各呈其异,读不胜读。有谁会生出“而今乐事他年泪”之慨呢。

事进步文学活动,1941年,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中有她的身影。而邵燕祥还只是广播电台的年轻记者。

那的确是个激情澎湃的火红年代。后来的文学研究者曾概括说,新中国成立“这个时间点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仿佛时间都是重新开始了的。因此,‘时代颂歌’便成为那个时代文学背景的主色调,中国文学也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一般而言,读者常常以是不是名家名作,确定购买、阅读取舍,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等知名奖项颁布之后,相关著作出现热销的原因之一。但对文学而言,谁写的?写的什么?怎么写?往往有着特殊的意味和价值。上世纪五六十有着,出自产业工人笔下的故事、诗歌,描写工厂生活的文学作品,在那些岁月里更受青睐。

后来,邵燕祥先生在《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一书中,曾反思当年的创作,把自己和真正的工人作者加以对比:1954年秋,我编定第二本诗集《到远方去》,收录了从1952年到1954年写的十九首诗……而我诗中的抒情主人却不像是“典型”的工农兵……其实都是发自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肺

《阅读课》

(Reading Lesson 1865)

作者奥古斯特·屠勒姆曲(Auguste Toulmouche 1829-1890)是法国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尤其以描绘奢侈的巴黎女性肖像著称。奥古斯特出生于南特,早年在本地学习绘画和雕塑,1846年到巴黎跟随画风兼顾古典主义和印象主义风格的夏尔·格莱尔(Charles Gleyre)学习,不久之后他开始专攻肖像画。他的油画写实细腻,除了美丽女性面部和服饰的细致描绘以外,室内装饰的描绘也非常到位,家具摆件都真实还原了当时的精美设计。

供图·配文 晓阳



高谈阔论

时光隧道中的阅读体验

冷养麦

睡眠困难的日子久了,精神头持续涣散,终于迎来了阅读理论书籍时耗力的时段。

然而,在持续不读书一些日子后,把时间交给电视的我,感觉更无趣,手机拿起来瞄一眼,然后放下,又拿起来——这样的状态也不是事儿……为了消磨时间的无聊,重新翻开书;翻读故事和情节曾经很熟悉,预判不费脑子的小说。

比较意外的是,尽管知道下一页将出现的情景,将是些什么人和物件儿,但在句读过程中,自己仍然能够收获新的认知。这让年届60的我很是欣慰,显然俺还没有老。

不过,说到典籍的重读,时光隧道中的绵延,于我来说,比局限于某一时刻的连续翻阅,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

先说中学被老师盖戳读的《红楼梦》。如果不是本人有翻书就会强迫自己扫到最后一页的恶习,那时的我不可能读完这部书,因为“真没啥好看的”。到了大学,屡屡接触到各类达人名士对之的鼓噪,于是感觉自己文化水平有进步的我又读了一回,可仍旧不喜欢。虽然作者笔法神采飘逸,而且每一篇章内,可以说国学“玩具”无处不在,可文中两个我觉得应该是好人的家伙,也就是说真话的薛蟠和焦大,被描述成垃圾人物,我觉得这实在不合适。年过30,又翻了一次,虽然仍旧没

觉得里面的诗有吸引力,但《红楼梦》的好,我看见了。可那些津津乐道该书的人,真的读懂了吗?院子里精致、美好,甚至很容易让人念想的情趣生活,和各类角色,细论起来,不过是“游戏”设计者给出的虚幻画卷,人家不经意地按一下任意键,幻化的梦境就灰飞烟灭了——人们到底醉心书中的什么东西呢?

再来说另外一个反复玩味的阅读体验。大学期间接触到海明威后,滋生出了软儒情愫。与《红楼梦》相比,简单直接的语言风格是一方面,另一层次,是海明威老师的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种说法很是诱人。可能就是这样的情结,我翻阅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海明威汉译作品。工作若干年后,有人问我喜欢海明威什么?我的回应还可以是之前的影像投射。可想到这家伙居然会自杀,觉得所谓“男子汉”的塑像,显然在心里缺乏必须有的坚韧和刚强,和鄙人建构的相关形象相去甚远:人不怕死不算英雄,不惧怕生,才是真正的汉子。

想着这件事,也想着或许俺只是被误导才情系海明威的。于是,转身又看了此人的文字,确实没太多“男子汉”痕迹,即便捕鱼的老头很厉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海明威依然不能祛魅。

瘟疫是一种“社会病”

——读《瘟疫:历史上的传染病大流行》

邹贻韬

与其将瘟疫史视作不幸世代的悲情叙事,毋宁说瘟疫史是一面人类遭遇厄时意外获得的社会“正容镜”——瘟疫处处交杂着世事人心,在生物疾病的面具后,瘟疫的真实面目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病”。

在“因疫之乱”或“防疫之治”的历史里,人类的社会属性好似疫情发展“药引”,作用于微末而影响久远,无论是梳理“瘟疫与人”还是谱录瘟疫经过,我们都须厘清瘟疫“社会病”的来龙去脉。

作者希冀《瘟疫》能让面对未知疫情的后来者“吸取许多教训”,并“广泛应用于其他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疾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这不是古今“同病”者的情感“相怜”,而是人类应对瘟疫智慧的“同舟共济”。

《瘟疫》讨论的重心在传染病大流行与人类政治的互动,溯源了历史上各种疾病背后的政治涌流。

社会人在瘟疫中的命运随所属政治体漂浮,这构成了“瘟疫政治”的第一个向度。《瘟疫》记述了美国政治核心圈的流感认知对疫苗推广进程的明显作用,不得不承认“政治怎么想,政策怎么走”左右着瘟疫时代的个人宿命。

法制思维下,个体无权侵占他者权利,因而防疫的牺牲是必然的,这是“瘟疫政治”的第二层面。试问政府若未介入个别公民私人领域,漠视警告任凭耐药菌流布开来,结核病能得到有效控制吗?稍作简单推想便能让我们明晓一个事实:威权型“瘟疫政治”着实将社会从病魔“地狱”拉回了太平人间。

事实上,在“瘟疫政治”里,作为集体的被治理者从来不是静默的,每一位渴望克服瘟疫影响的个体均可以,并时常参与着“瘟疫政治”。《瘟疫》讲述了1904年11月发生在里约热内卢的“疫苗起义”:巴西政府采纳深受英国生物医学教育影响之专家的建议,决意全面推广牛痘疫苗来抗御天花疫情,但巴西非裔坚决要求使用故土的传统人痘接种,两派意见分歧最终触发了波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大规模骚乱。

政治不是瘟疫的发端,但瘟疫自发生之时起,便紧依政治而存在。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形象地演绎了疾病污名化欺压患病者的文化效应:生理层面的疾病被他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

疾病污名的社会性绞杀可能针对个体,比如爱尔兰民妇、厨师玛丽·梅伦因被发现携带伤寒杆菌,且曾传染53人而被强制隔离于孤岛23年。“玛丽遭受的一切不幸仅仅因为她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健康带菌者。”成为饱受歧视、丧失自由的“伤寒玛丽”,这全然是社群对疫情恐惧带来的社会性绞杀。

疾病污名的社会性绞杀亦会针对社会群体,人们很容易将接收瘟疫病患、研究调查瘟疫的医院、医生视作“为病作伴”之人。

不论技术、制度乃至个体生活水平如何向好发展,“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是不可改变的”。麦克尼尔所言“脆弱”,既指选出的新病毒挑战人体免疫力,更暗示着作为“社会病”的瘟疫将代更新,永远伴随人类社会。

只要生物意义上的人类代代存续,“下一场瘟疫”就将永远“在路上”,挑战或许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我们重构世界的能力也远超现有的设想。



《出水芙蓉》钱选画 络因供图